

# 古汉字“变形意化”现象初探\*

王鹏远

(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)

**提 要** 本文回顾了学界目前有关“变形意化”的研究,对“变形意化”的概念进行了辨析,梳理了“意化”“变形意化”“理据重构”等概念之间的关系,并对古文字和隶楷文字阶段的“变形意化”现象进行举例分析。

**关键词** 变形意化 构形学 古汉字

## 1. 以往研究的回顾

刘钊(2011:109-118)在《古文字构形学》中指出古文字中存在“变形音化”的现象,对其概念进行了讨论并举出丰富的例证。在对文字形体进行分析时,作者其实还使用了“变形义化”的术语,但并未对它作任何定义。比如刘钊(2011:142-143)在考释甲骨文的“𠄎(督)”字时说:

其实我们有理由推测甲骨文的这个字很可能就是“督”字,也就是说“督”字本来就是从日叔声的一个字,“督”字本义可能并非“督察”之意,只是因为后来用为“察”义,人们才“变形义化”,把“督”字所从的“日”旁改成了“目”旁以迎合字义。

作者在讨论“力”和“刀”旁的讹混现象时指出早期秦汉文字的“筋”皆从刀作,写作从“力”的字形是后起的。作者对这种讹变发生的原因进行推测:

后来“筋”字所从之“刀”讹混为“力”,一是因为“刀”“力”字形接近,本极易混淆,二是因为这是一种“变形义化”,即把“刀”旁改成“力”,以迎合“筋”字“筋力”、“肉之力”的字义。当然,《说文》训“筋”字为“肉之力”,显然是在“筋”字已经由从“刀”讹混为从“力”后据此作出的解释。

---

\* 该文原为本人硕士学位论文《古汉字“变形音化”现象再研究》(复旦大学 2022 年,指导教师:邹可晶副研究员)的“附录二”部分,在投稿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。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,谨致谢忱。

在《谈古文字资料在古汉语研究中的重要性》一文中,刘钊(2005:54-58)指出“变形音化”与“变形义化”是一对相对的概念,并对“变形义化”的概念作了定义:

“变形义化”是指会意字或形声字在演变过程中,为了更明确地标示字义,利用会意字或形声字的一部分,故意将其改造成与这一部分形体相近并能提示整个字义的义符。……“变形义化”的例子如“战阵”、“军阵”的“阵”字本来是借“陈”姓之“陈”为之,因为古代战争多为“车战”,而“陈”字所从的“東”与“車”形体又很接近,为了更明确地标示字义,就故意将“東”改造成与其形体相近并能提示字义的“車”。

李旻姪(2005:134-136)认为“变形义化”是“代换部件”的一种类型,并举了“𠄎→𠄎”“箒→箒”“庚→庚”“𠄎→𠄎”四例。不过作者所谓的“变形义化”是指“甲骨文‘从人形类’的字,在卜辞中作人名、地名或方名(或族名)等不同用法时,用改从部件之方法来区别之”,和刘钊所谓的“变形义化”并非同一种现象。

吴文文(2009)指出汉碑中的俗体字存在“变形音化”和“变形义化”两种形体演变规律,作者把后者定义为:

在演变的过程中,一些汉字的某个不表义的构件,往往会被改造成一个形体相近但又能反映该字字义的新构件。这样一种现象,我们不妨套用刘钊先生“变形音化”的概念,称之为“变形义化”。

吴文文在文中举了“宝→寶(变形义化为从“珍”)”、“窥→𠄎(变形义化为从视)”、“龟→龜(变形义化为从虫)”、“宽→寬(变形义化为从心)”、“闔→闔(变形义化为从盖)”五个例子来说明该现象。

吴文文(2012:77-80)在另一篇有关汉碑、汉简中与字义有关的字形演变规律的文章中讨论了“加注意符”、“形旁代换”和“变形义化”现象。其中“变形义化”一节除了前文所举的例子之外,还增加了“𠄎→𠄎→𠄎(先变形义化为亡,后变形义化为哭)”、“𠄎→泉(变形义化为水)”、“𠄎→𠄎(变形义化为合)”、“界→界(变形义化为分)”、“迂→逕(变形义化为升)”、“黍→黍(变形义化为米)”等例证。

沈春兰(2009:37)设专章讨论“因‘变形义化’引起的重解”。不过作者所论“变形义化”与刘钊和吴文文所讨论的“变形义化”并非同一种现象:

所谓“变形义化”指的是汉字在发展和使用过程中,由于形体的变化、意义的发展和字用的变迁而出现字形与字义关系的疏远,用字者在追求汉字表意的驱使下,对原本不表义的形体进行重新分析使之具有表义功能,或者通过增加、改换义符来恢复或加强字形与字义之间联系的现象。

该定义实际上包含了“重新分析”、“增加意符”和“改换意符”三种情况,并不包含通过改造字形的某一部分来提示字义的情况。文中同样没有与前人所论的“变

形义化”相关的例证。

李娟(2016:26)把“义化”分为“整字义化”、“构件义化”和“变形义化”三类。其中“变形义化”是指:

字形演变过程中,表形构件转化为形近的表义构件,且该构件能够合理地解释字义,这种情况我们称为构件变形义化。

从作者的定义可知,作者所谓的“变形义化”是指由“形符”到“义符”的转变。作者所举的一些例子确实和刘钊、吴文文所谓“变形义化”相合,如“𠄎→𠄎(变形义化为从步)”<sup>①</sup>、“𠄎→𠄎→𠄎(先变形义化为从亡,后变形义化为从哭)”等,但其余大部分例子其实属于“理据重构”,而非我们所讨论的“变形义化”。

梁春胜(2013:301-306)在《楷书部件演变研究》中设专节讨论“变形义化”。作者采用了刘钊对“变形义化”的定义,举了“后→後(变形义化为不及)”、“𦵏→𦵏(变形义化为死)”、“琴→琴(变形义化为竹)”、“琴→琴(变形义化为木)”、“磔→磔(变形义化为裂)”、“戚→戚(变形义化为人)”、“窺→窺(变形义化为从视)”、“德→德(变形义化为从惠)”、“迂→迂(变形义化为从升)”“糞→糞/糞(变形义化为从土)”、“凿→鑿(变形义化为从毁)”等例。

以上就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在理论方面讨论“变形义化”的主要成果。从前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,学界已经认识到“变形义化”现象的存在,但不同学者对该概念的理解仍有分歧。隶楷文字中“变形义化”的现象已经被注意并且作为构形学的一部分进行过归纳和研究,但学界对古文字阶段该现象的研究依然较为有限,目前被明确指出的例证仅有“阵”和“丧”两例。

虽然在概念上并未取得一致意见,但从有关文字考释的文章来看,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该现象。

张鑫裕(2019:49-78)指出“溢”“溢”所从之声旁在古文字中写作𦵏,在隶楷文字中写作𦵏,与写作益的“益”旁区别明显。对于两字后来改为从“益”的情况,张鑫裕解释说:“溢出、增益意义有相似性,溢号是死后加给益主的,二字从‘益’可能也出于把声符改造成形近义符的考虑。”

邬可晶(2021:1-20)指出“麗”在秦文字中有顶端作“二‘丙’/‘两’”形者,如𦵏(《珍秦斋藏印(秦印篇)》336),“似是‘麗(麗)’的‘变形义化’”。邬可晶把金文“𦵏”释作“俦器”之{俦}的本字,该字在金文中或有作𦵏(《集成》02569)者,所从二器皿与“再”字中叠置的两器皿形近。邬可晶说:“‘俦器’之‘俦’字不能读为‘再’,但‘再’

<sup>①</sup> 作者认为𠄎和𠄎为一字,故将其看作“变形义化”。不过二字实非一字,𠄎为“越”之初文,𠄎为“越”字。

可训‘二’、‘重’，与训‘类’、‘匹’的‘侑’义有关联，有些‘𠄎’字所从与‘再’形近（仅有无‘冫（己）’之别），也许是当时人有意改造的。”

陈剑（2020:66-103）认为“𠄎”在最初既表示{𠄎}又表示{瓜}，西周金文的𠄎来源于𠄎形。对于战国文字中写作𠄎（《集成》9720），以往学者分析为“外象其蔓内象瓜实”的“瓜”，陈剑说：“它与后来的𠄎类形一样，大概都应该看作又有‘重新分析’‘理据重构’，试图在其形中凸显出‘瓜形’之用意。但归根结底，诸形都是来自更早古文字的𠄎、𠄎类形的。”

“𠄎”字已见于甲骨文，字形作𠄎，象头皮之形。西周金文加“或”声作𠄎。格仲鼎中有“𠄎”字作𠄎，在“戈”下添加“𠄎”旁。谢明文（2021）对该现象作出解释：“我认为一种很可能情况，就是‘或’讹从‘戈’形后，当时制作铭文的人对‘𠄎’字进行了理据重构，将讹变而来的‘戈’当作义符，于是添加双手，整个字形表示双手持戈砍伐脑袋之形。”

从以上几个例子来看，“变形义化”对文字考释和解释文字构形都有较为重要的作用，因此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辨析并对相关例证作进一步梳理。本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。

## 2. “变形意化”概念辨析

在讨论“变形意化”之前，我们先来考察一下“意化”的概念。

现代文字学将汉字的字符分为“意符”、“音符”和“记号”三种类型，其中“记号”占比很小，对于绝大多数字符而言，要么是“意符”，要么是“音符”。与“音符”“意符”相配的是“音化”“意化”的概念。“意化”是汉字中意符功能凸显的现象，意符数量的增加、意符表意能力的增强都属于“意化”。

意符的数量增加，比如𠄎原本是从𠄎或声的形声字，𠄎在“戈”下添加“𠄎”，使原来形声结构的字变成表示“双手持戈砍伐脑袋之形”的会意字。“糞”本为会意字，古文字作𠄎，象双手持箕洒扫之形。隶变之后原来的意符全部变为记号。“糞”的异体字糞将记号“米”改造成形近的意符“土”。

意符的表意能力增强有如下三种表现：一是意符与字所表示的词的义项之间联系更加直接。比如“慈”从心兹声，是为{慈爱}造的专字。因为磁石引铁和慈母爱子有相似之处，因此由{慈爱}引申出{磁石}的义项（参看裘锡圭，2021:305）。《管子·地数》：“上有慈石者，其下有铜金。”原来的意符“心”和{磁石}的联系虽不至于完全消失，但也已经较为间接。后来在“慈”的基础上添加意符“石”造了“磁”字，“石”和{磁石}之间的联系就比较直接了。二是意符与字所表示的词的所指之间的联系更为直接。比如“砲”是为抛石机所发的机石造的专字，从石

包声<sup>①</sup>。南宋时将石头换为内置火药的生铁铸品。{砲}的词义没有改变,但所指却由机石变成了内置火药的铁制品,因此后来把“石”换为“火”造了“炮”字来表示{砲}<sup>②</sup>。{砲}的本质特征是以“抛”的形式来投掷某种东西,以此来对敌方造成破坏。至于“抛”的是石头还是铁,里面有没有火药,其实对“炮”的词义并没有影响,所以“砲”字中的“石”旁和“炮”字中的“火”旁其实都是和词的所指有关,而和词义无关。词义没变,但词的所指变了。把“炮”中的“石”换成“火”,和变化了的所指产生了新的联系,因此我们可以说“炮”字中的意符表意能力增强了<sup>③</sup>。《说文》“鞮,足衣也”,字从“韋”。大徐本《说文》说“今俗作鞮,非是”。《集韵》中收录“𦍋”,亦为“袜”的异体字。{袜}用从“韦”“革”“皮”的字记录,是因为时人的袜子多以皮韦制成。后来袜子改用丝织品制作,即所谓“罗袜”“绣袜”“素袜”等。“韦”“革”“皮”等意符与{袜}的所指之间的联系减弱。居延简中已见𦍋字,字形从“糸”。《类篇·巾部》:“𦍋,足衣也。”从“巾”和“糸”的字多是丝织品,“革/皮/韦”旁换成“巾/糸”旁,体现了袜子材质的变化<sup>④</sup>。三是意符与意符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豁。比如“伐”象以戈伐人头之形,甲骨文中写作𠄎、𠄏。金文或在“戈”旁添加“又”形作𠄐(《集成》1011)。该形体可以看作𠄐的繁体,这种形体上的增繁其实也有增加表意功能的作用。“又”和{伐}虽然无论在词义还是所指方面都没有什么联系,但该意符使原字形中“戈”和“人”的关系更为显豁(象持戈杀人之形),因此也可以说增强了表意能力。

意化的途径主要有三种:一是添加意符,如“慈→磁”“伐→𠄐”;二是改换意符,如“砲→炮”“鞮→襪”;三是变形意化,如“糞→𦍋”。“𦍋→𦍋”兼具“添加意符”和“变形意化”两种情况,参看下文分析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意符数量增加”并不单纯依靠“添加意符”实现,也可以通过“改换意符”(如“𦍋”)和“变形意化”(如“𦍋”)实现。

“变形意化”和“理据重构”是密切相关的两种现象。对于“理据重构”,王宁在《汉

① “炮”和“抛”同源,取“抛石”之意。参看蒋绍愚(2005:285-286)。相关字形的梳理可参看裘锡圭(2021:225-226)。












② 《说文》:“炮,毛炙肉也。”与表示{砲}的“炮”是同形字的关系。

















③ “炮”在现代汉语中也可以指爆竹。因为火炮和爆竹都会爆炸,所以基于相似性由“火炮”引申出“爆竹”的含义。“爆竹”不再有“抛”的义素,“爆炸”成为其核心义素。我们可以说,在表示“爆竹”这个意义时,{炮}的词义和所指都发生了变化。在这个意义上,“炮”中的“火”旁和词义相关。


④ {袜}的本质特征是用来包裹足部的衣物,无论是用什么材料制作,都对其词义没有影响。魏晋时期的碑刻文字中已经出现从“衣”的𦍋,隋唐时期出现“襪”。“袜/襪”在后代逐渐流行。“袜”属于一种衣物,从“革/皮/韦/巾/糸”到“衣”的替换,其实是意符从和所指联系转变为和词义联系。这种转换说不上表意能力增强还是减弱。

字构形学讲座》中下过如下定义(王宁,2002:29-30):

理据重构:形体因书写而变异不能与意义统一时,在使用者表意意识的驱使下,会重新寻求构意去与它的新形切合,或附会它的意义去重新设计它的构形。

从该定义来看,“理据重构”包含两种情况,一种是对字形结构进行重新分析,一种是对字形主动进行改造。前一种情况文字原有的构形理据并不一定消失,比如“东”古文字作,象束囊之形,假借表示{东方}。《说文》小篆作,字形与古文字基本相同,原有的构形理据并未完全消失。《说文》引官溥说将该字构形分析为“从日在木中”,是将小篆字形拆解为和,对其构形理据进行了重新分析。后一种情况文字原有的构形理据被破坏,新的字形已经不能用原有的构形理据解释。比如“馘”字写作,在“戈”下添加了収旁。古文字中“或”字和从“或”诸字的“戈”旁下未见加“収”旁者,且该字形中与上面的圈形连接为一个整体,因此该字的构形理据已经发生了改变。“桀”本作在木上之形。《说文》:“桀,磔也。”魏道宝碑记“桀”字作,将上部的“舛”改造为“列”,应该是因为“磔”与“裂”义近。前引梁春胜文指出“磔”或写作,“裂”应当是在写作的“桀”字基础上进一步改造而成的。字形只能分析为从石从裂,不能再分析为从桀石声。







第一种情况的理据重构只是一种对字形的解释,并不具备构形学的意义。因此现代文字学家分析的构形,只会将其分析为象囊囊之形的象形字,而不会将其分析为象日在木中的会意字。第二种情况的理据重构是按照对构形理据新的理解改造原有字形,实质上属于一种“造字”活动,因此具备构形学的意义。前引陈剑文认为→→为“理据重构”,显然指的是第二种情况。如果改造之后的字形音符数量增加或表音能力增强,则可以称为“变形音化”;如果改造之后的字形意符数量增加或表意能力增强,则可以称为“变形意化”。有时候也会有“变形音化”和“变形意化”同时出现的情况,比如谢明文(2017:53)指出甲骨文从声,为“饱”字初文。金文或写作,其中的为“腹”的表意初文。把“勺”变成“𠂇”,“可能同时含有变形音化和变形义化两种因素”。“𩚑”原本作,象人张口在酉中饮酒之形。膳夫山鼎中“𩚑”字作,原来的分解为“今”旁和“欠”旁,其中“今”和{𩚑}在读音上相近,“欠”与{𩚑}在词义上有关。“甫”甲骨文作,从中从田,为“圃”的初文。西周金文中“甫”或用来表示{父},如季子康罍“乐我甫(父)兄”、趯簋“作甫(父)庚宝尊簋”。“甫”在金文中或作,上部的“中”改造成“父”,可能兼具表音和表意两种功能。邬可晶(2019:64-83)认为西周金文中的 (臻)为{臻}的表意初文,“晋”古文字从,与“臻”写法有别。汉代文字中才大量出现从的“晋”字,这“很可能也跟当时人已

不知‘晋’本从‘舜’，‘舜’‘晋’则音义皆近有关。”“暑”在隶楷文字中或写作，在“者”下添加“灺”改造为“煮”。“煮”的韵母相对于“者”而言更接近“暑”，且在词义上与“暑”类似，都表示温度高。





### 3. “变形意化”举例

以下我们以时代为序，列举一些前文没有提到的例子。


#### 3.1 臣

“臣”字早期文字作，为竖目之形。战国文字中“臣”上部或作弯折之形，如（《玺汇》2399）。在此基础上或加一斜笔，将“臣”上部改造成意符“人”，如（《玺汇》3326）。楚文字“僕”作（郭·老甲2），从臣羹声。又作（包137），所从“臣”旁上部亦改造为“人”。楚玺中有（《玺汇》3527）字，从臣付声，为“僕”的异体字，其中的“人”为“付”和“臣”共有的偏旁。把“臣”上部弯折的笔画改造成“人”可看作变形意化。



#### 3.2 尚

“尚”早期文字作，是在门(堂)的基础上加分化符号“八”形成的分化字。或加“口”作，为战国各系文字所继承。晋系文字在“尚”基础上加“上”，形成一个双声符字，如（《玺汇》2357）、（中山王壶）。《玺汇》3783为一方晋玺：











该玺印文为“司马尚”，其中“尚”字上部由“八”形改造为形，形成“高”字。“高”与“尚”词义相关，可以看作一例变形意化。

#### 3.3 祭





“祭”见于楚文字材料中“夏祭”“冬祭”“屈祭”“远祭”四个月的月名，秦简月名中与之相应之字作“夕”。清华简《楚居》简4-5记载：“至熊绎与屈紃，使都嗑卜徙于夷屯，为榭室=(室，室)既成，无以内之，乃窃都人之牲以祭。惧其主，夜而内，抵今日祭=(祭，祭)必夜。”由此可知“祭”为夜祭之专名。新蔡简中“祭”字或写作、，在“亦”上加“夕”，改造成“夜”。赖怡璇(2020)指出：“葛陵简改从夜不仅是声符通用，亦为义化现象。”

#### 3.4 嘉







“嘉”甲骨文作，从壹力(加)声。西周金文作，在“力”下加“口”旁，与“力”组成声符“加”。中山王壶“嘉”字作，将“口”旁移到“壹”旁下，与“壹”组成“喜”。这种写法也见于秦隶，如里耶秦简“嘉”字或作。《风过耳堂秦印辑录》431号为一方

印文为“杨嘉”的私玺,其中“嘉”字作,在“壺”旁下添加“口”组成“喜”字。“嘉”和“喜”都有“喜乐”义,《礼记·礼运》:“以嘉魂魄”,郑玄注:“嘉,乐也。”《春秋·襄公十九年》“郑杀其大夫公子嘉”,《公羊传》作“公子喜”。、和都可以看作变形意化。















### 3.5 窑

“窑”金文作、等形,战国文字多写作、,从宀或穴。单育辰(2015)认为“窑”为“甸”之讹形。魏宜辉(2012:633-640)认为“窑”是为{陶}造的会意字,在表现陶器的同时,一并交代烧陶的窑灶。邬可晶(2018:2-20)赞同单育辰对字形的解释,但认为魏宜辉把“窑”分析为会意字的看法可能更符合战国时人的心理。邬可晶认为“‘窑’这个词可能是从‘甸(陶)’分化出来的,‘甸(陶)’原来也可指制陶烧瓦的灶(即‘所以作陶’者),所以楚玺‘窑(甸/陶)’字从‘穴’作”。如邬可晶说,“甸→窑”可看作一例变形意化。


### 3.6 岳


裘锡圭(2012:155-159)指出《说文》篆文和其实都来源于古文字的字,该字从“品”,是{讷}的本字。《说文》:“讷,多言也。”《说文》篆文作“从品相连”之形,与古文字字形有明显的联系。“岳”在古书中多与“巖”通用,如“巖巖”、“巖巖”亦作“巖岳”、“巖岳”。裘锡圭说:“颇疑古代本无从‘山’的‘岳’字,但是有时假借‘从品相连’的‘岳’字为‘巖’。‘巖’字从‘山’,‘品’字下部恰与‘山’字相似。因此,有的人就误以为用如‘岳’字的‘品’是从‘山’的,把它跟一般的‘品’字分了开来。见于《说文》的篆文‘岳’,大概是在这种误会产生之后追造出来的。”诚如裘锡圭说,则改造为可以看作变形意化。

### 3.7 蠱



《说文》:“,毒虫也,象形。,蝥或从虫。”“,蟲也。象形。从内。”《说文》将“蠱”和“萬”立为两个不同的字头,看作不同的字。但是从古文字材料看,“蠱”和“萬”应当由一字分化。裘锡圭(2021:161)指出:“甲骨文字已有借表千万之{万}的例子。周代金文‘萬’字作、等形,本是的繁体。后来‘萬’专用来表数,专用来表示本义,分化成了两个字。《说文》虽训‘萬’为‘蟲’,但已不知‘萬’与本由一字分化。”小篆的较甲骨文的象形程度有所降低,被错误分析为和两个部件,实际已经成为记号。将改造成形近的意符“虫”,可以看作变形意化。

### 3.8 卿












“卿”为“飨”的初文,在金文中写作,象两人对食之形。金文中“卿”除了表示{飨}和{卿}外,还常假借作{向}。册命金文中常见“北卿”“南卿”,亦即“北向”“南向”。夔公盃中“乃自作配,卿民”,裘锡圭(2002)读为“向民”,谓“向民”就是“率民向方”。秦汉简中或把“卿”假借为{乡},如岳麓秦简二《数》简134:“凡三卿(乡),

其一卿(乡)卒千人,一卿(乡)七百人,一卿(乡)五百人,今上归千人,欲以人数衰之,问几可(何)归几几可(何)?”更为常见的是用“乡”表示{乡}。“乡”写作 (马王堆·老子乙),将“卿”中的人形改为“邑”旁,是为{乡}所造的专字。“乡”为基层行政单位,“邑”旁在其中具有表意作用,可以看作变形意化。





### 3.9 剝

《方言》:“剝、剝,解也。”郭璞注:“剝音俪。”华学诚(2006:882-883)指出:“剝,字之误也,据郭音,当作‘剝’。”“剝”有“分解”义,《荀子·强国》:“(莫邪)则剝盘孟,刎牛马,忽然耳。”杨倞注:“剝,割也。”“剝”也有“割裂”的意思,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:“君王命剝圭以为戚秘。”杜预注:“戚,斧也。秘,柄也。破圭玉以饰斧柄。”“剝”古文写作(《集成》8273),陈剑(2007:266-267)谓“字形作以刀向豕之形,表‘剥皮’、‘割裂’等之意至为明显”。秦汉文字中“豕”多讹为“豕”形,“剝”字写作(剝),与“剝”字除去“虫”的部件同形。“剝”本为从刀蠹声的形声字,在被重新分析为从虫从剥的会意字之后调整部件布局,并改“剝”为“剝”,形成“剝”字。这可以看作一例变形意化。





### 3.10 鼓

“鼓”字甲骨文作,象持桴击鼓之形。战国文字或从“支”作,或从“支”作。其中的“支”当为之省形。战国文字这两种写法在秦汉文字中均有反映,前者如、,后者如。“鼓”在“支”旁基础上加一斜笔即成为“皮”字,如 (《隶辨》3.25)、 (《隶辨》3.26)。《缙述堂古印存》87页著录一方印文为“鼓阳铁令”的汉印,其中的“鼓”写作。石继承(2015:51-52)指出该篆文其实是转写了隶楷文字的写法,“这种写法的‘皮’既与‘支’形体相近,又兼具表意作用。”如石继承说,则可看作一例变形意化。

### 3.11 妻

“妻”见于甲骨文,字形作,象以手抓取女子头发之形。西周金文作,“又”形移于头发之上。秦文字作,与西周金文构形基本相同。段峻德墓志中“妻”字作,在“妻”字上部添加“口”旁形成“事”字。郑舒婷(2020:4)指出这反映了古人“持事,妻职也”的思想观念。

### 3.12 覓

《说文》:“覓,衰视也。”“覓”之“衰视”义不见于古书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:“古者,太史顺时覓土。”韦昭注:“覓,视也。”由“察看”引申出“寻求”义。张衡《西京赋》:“覓往昔之遗馆,获林光于秦余。”段玉裁指出“俗有寻觅字,此篆之讹体”。“辰”在隶楷文字中或写作“爪”,如《口伯超墓志》中“派”作,《袁景慎墓志》中“覓”字作。“覓”大徐本籀文作,小徐本籀文作。小徐本籀文可以隶定作“覓”。“覓”上部的“辰”讹变成“爪”,就形成了“觅”字。《集韵·锡韵》:“觅,亦书作覓”。

《柴季兰等四十余人造像记》中“覓”写作覓，上部的“爪”讹为“不”，以“不见”会意，可以看作变形意化。

### 3.13 聖

“聖”在隶楷文字中写作聖，“耳”上的一横或与下部分离作聖。“口”旁左侧部件受类化作用的影响，或作聖。《龙龕手鏡·玉部》：“聖，古文，音聖。”“聖”当即来源于聖省去上面一长横。隋开皇十三年《诸葛子恒等造像颂》云：“堂堂聖德，巍巍帝功。”对于“聖”字，张涌泉(2010:114)指出其为“聖”字，“其字上明下王，盖会意也。”张涌泉认为“聖”为“全体创造”的俗字，即“完全抛开正字，另起炉灶，用全新的构件创制新字”。《龙龕手鏡》中的“聖”是“聖”的变体。裘锡圭在张涌泉的意见下加按语云：“‘聖’与‘聖’字形相近，恐怕难以认为完全抛开正字而造的俗字，至少此例不典型。”裘锡圭之说可信，我们认为“聖”就是在聖这类字形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形成的。这种改造当然也受到了“明王为圣”观念的影响，很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改造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陈 剑 2007 《金文“象”字考释》，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》，线装书局。
- 陈 剑 2020 《释瓜》，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9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华学诚 2006 《扬雄方言校释汇证》，中华书局。
- 蒋绍愚 2005 《古汉语词汇纲要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- 赖怡璇 2020 《说“寮”》，《励耘语言学刊》第1辑，中华书局。
- 梁春胜 2013 《楷书部件演变研究》，线装书局。
- 李 娟 2016 《古文字演变变化现象研究》，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指导教师：陈晓强副教授。
- 李旻婷 2005 《甲骨文字构形研究》，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指导教师：蔡哲茂教授。
- 刘 钊 2005 《谈古文字资料在古汉语研究中的重要性》，《古汉语研究》第3期。
- 刘 钊 2011 《古文字构形学》（修订本），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- 裘锡圭 2002 《夔公盃铭文考释》，《夔公盃——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》，线装书局。
- 裘锡圭 2012 《说“岳”“巖”》，《裘锡圭学术文集》甲骨文卷，复旦大学出版社。
- 裘锡圭 2021 《文字学概要》（修订本），商务印书馆。
- 单育辰 2015 《占毕随录之十八》，<http://www.bsm.org.cn/?chujian/6390.html>, 04-22。
- 沈春兰 2009 《论汉字的重解》，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指导教师：林志强教授。
- 石继承 2015 《汉印研究二题》，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指导教师：裘锡圭教授。
- 王 宁 2002 《汉字构形学讲座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魏宜辉 2012 《说“甸”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9辑，中华书局。

（下转 69 页）